

修 辞 学 论 文 集
第 三 集

中国修辞学会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75印张 2插页 357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850

书号: 7173·724 定价: 2.85元

前 言

• 张 静

中国修辞学会委托张寿康同志和我主编两种论文集：一种是《修辞和修辞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一种是《修辞学论文集》，由张寿康和我主编，并请吴士文、王德春、柴春华、郑颐寿、林承璋五同志任编委，郑颐寿、林承璋二同志为责任编委，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集、第二集已与读者见面，第三集于1985年出版。

这一本论文集分总论、语体风格论析、词语修辞论析、句篇修辞论析、修辞格式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研究六个部分，共收论文39篇。

汉语修辞的研究，在我国发轫很早。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的论述。魏晋南北朝以后，学者们的修辞意识更为强烈，较系统地涉及修辞问题的著作日益增多，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近二十篇是涉及修辞现象的，而且很值得借鉴。到了清代，研究修辞现象的著作就更多了。可以说，汉语修辞的研究历史是漫长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价值很高的论述。但是，由于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的限制，未能使这种研究成为有完整体系的汉语修辞学。也就是说，他们研究修

辞不是为了修辞本身，而是作为文献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作为文学评论、文章作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研究的范围是非常窄狭的，不是研究全部修辞问题，只是研究一些零零碎碎仅仅跟修辞有关的问题。只能说这种研究是科学的修辞学的酝酿阶段，或者说是“前科学”阶段。

修辞学从文献学、文学评论、文章作法中独立出来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进行系统的研究，都是现代的事，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1923年）、唐钺的《修辞格》（1923年）、《修辞学》（1925年）、王易的《修辞学》（1926年）、《修辞学通论》（1930年），等等，都在汉语修辞学的创建上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但实用价值较大、科学性较强、体系较完整的，还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汉语修辞学的历史，是从《修辞学发凡》算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汉语修辞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接着又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各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课全都增加了修辞部分，并相继出版了不少修辞专著，这不仅有助于修辞知识的普及，而且促进了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但与语言的其他部门相比较，汉语修辞学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广泛，在理论上、体系上也没有太大的建树和明显的突破，多半表现为对《修辞学发凡》体系的补充或调整，研讨的学术气氛也不那么热烈。

十年动乱之后，随着语言科学的突飞猛进，汉语修辞学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修辞学会的成立和各大区修辞学会以及某些省的修辞学会的成立，使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广大会员在引进新理论、探求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等方面作了卓有成

效的努力，把汉语修辞学推进到向纵深发展的提高阶段，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运用艺术的科学，它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法和规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但多年来修辞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即把修辞研究成果纯知识化，与语言运用的实际结合得不够紧密，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以修辞的目的来统率修辞知识，在帮助人们形成较高的语言能力方面还没有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因而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不是说研究语言体系中表达手段的描写修辞学不重要，恰恰相反，系统的科学的描写理论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修辞学长足发展的表征。我们只是强调要突出修辞的目的，以准确、鲜明、生动、精练的表情达意的追求为纲来研讨、阐述修辞理论和修辞现象，把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全社会关注的功能修辞学上来。

近年来，许多同志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組合的框架里跳了出来，开始研究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篇章的调整，并扩展到语体风格的研究，以及超语言因素（突破语言规范的现象、非语言要素的符号、话语以外的客观环境、联想等）的研究，把这种研究跟传统的辞格研究搭配起来，方向是正确的。这种研究可以把修辞的学习和研究扩展到更广阔的语言运用的领域，可以让人们在较大范围内去考察语言运用的效果。作为努力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把修辞的研究同美学结合起来，同心理学结合起来，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伦理学、风格学结合起来，甚至进一步把修辞学当作语言（言语）美学来研究，我们在修辞研究上也许可以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希望修辞学界的同志群策群力，开创我国修辞学研究的新局面。

趁《修辞学论文集》第三集书成之机，谈几点想法，权当前言，并就正于中国修辞学会会员同志们。

福建人民出版社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修辞学会的工作，为修辞知识的普及和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代表中国修辞学会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张 静 前 言

• 总 论 •

- [1] 倪祥和 修辞的活的灵魂
——论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
- [13] 王德春 论话语修辞
- [31] 张寿康 修辞——修辞学的一个重要部门
(修辞之学提纲)
- [41] 郑颐寿 修辞过程说
- [55] 李金苓 试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次繁荣
- [68] 张维耿 汉语修辞的民族特色初探
- [81] 何蕴秀 论语言的美的社会性
- [91] 林兴仁 同义形式选择与信息传递的关系
- [104] 刘振举 《修辞学发凡》对同义修辞手段研究的启迪
- [113] 廖化津 中国修辞学的开端
——《墨子·小取》与修辞

• 语体风格论析 •

- [132] 李熙宗 公文语体的基本语言特征
- [145] 黎运汉 专门科学体的风格特点
- [157] 王 洁 司法实践中语言修辞漫议

• 词语修辞论析 •

- [162] 柴春华 词语修辞浅论
- [176] 郑远汉 语言的临时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修辞作用
- [192] 钟 颖 发展中的科技词语修辞艺术

[203]	袁 晖	论词语的变异运用
[220]	马挺生	论命名艺术
[232]	姜剑云	论词的内部形式及其修辞价值
[243]	周长楫	略论语音修辞
[257]	池太宁	试论汉字修辞构字法
· 句篇修辞论析 ·		
[264]	倪宝元	“存在”的表达
[277]	黄岳洲	三论复句的修辞现象
[287]	郑文贞	句式与篇章
[302]	薛晓梦	题目与修辞
· 修辞格式研究 ·		
[312]	韩荔华 侯 敏	修辞手法与文学表现手法关系初议
[323]	戴婉莹	“相似点”的身分与隐现
[333]	张明奎	试谈比拟和比喻的划界问题
[346]	胡安良	模糊思维在“托物寄情”中的表现
[352]	张国庆	同字格说略
[366]	陈 坚	曹禺剧作中“引用”手段的应用
· 文学作品语言研究 ·		
[376]	陆文蔚	《论语》的语言艺术初探
[386]	周舸岷 陈淑钦	清淡之风与魏晋的言语修辞
[397]	潘晓东	《红楼梦》两种本子的修辞比较 ——比较之二：生动简洁
[413]	邹光椿	自然得体 语俏色艳 ——试析曹雪芹妙用修辞格
[427]	潘嘉静	博采口语 刻画工妍

		——略谈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修辞艺术
[436]	吴士文 关 滢	《绿》的修辞分析
[443]	俞正贻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试谈茅盾作品中方言俗语的表达效果
[451]	陈 晨	略论扬州说书的语言艺术

修辞的活的灵魂

——论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

· 倪祥和

修辞的原则，不同于修辞学研究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修辞原则，是指调整、修饰语言以提高表达效果所必须遵循的原理、标准和依据。

在修辞学的研究中，最先强调地提出修辞原则的是陈望道先生。他在《修辞学发凡》里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并认为这是“修辞的标准、依据”。这是陈望道对科学修辞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此后，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也明确提出“修辞的原则”的论题。他认为“修辞的原则是：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并详细地举例论证了这两个原则。陈、张两位先生，都把情境或语境作为修辞的原则，这是一致的，但张先生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内容统一”看作修辞的要件，这和陈望道对修辞要“适应题旨”的提法，角度不同。“注意修辞效果”这一原则，陈先生是不单提的。

近几年来，在专著中有专节谈到修辞原则的首先是倪宝元先生。他谈到“讲修辞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必须切合思想

内容”；“二、必须适合情境”。^①近年来，吴士文的《修辞讲话》、吴家珍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和郑颐寿的《比较修辞》，也专节谈了有关修辞的三个原则。倪宝元的提法跟陈望道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情境”的解释中包括了“文体和风格”，而吴士文、吴家珍和郑颐寿则把“语体”单独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这都是有见地的。

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讲修辞的书不很重视修辞的原则，或则不提，或则没有上升到原则高度；就是讲究修辞原则的，提法也并不一致，本文试图再从理论上作一点探讨和阐述。

我以为讲究修辞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这是修辞的活的灵魂。

首先，修辞要适切题旨。《修辞学发凡》中所说的“题旨”，就是“立言的意旨”，即说话写文章的主题、中心思想或目的，也就是说写的思想内容。修辞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它所要表达的是思想内容，讲究怎样表达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因此，词句的斟酌和取舍，选择和配合，修辞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创造和创新，以至组段谋篇的修辞，语体风格的形成，都是直接或间接以服从表达思想内容为先决条件的。词语、句子、辞格等，它们本身没有好坏美丑、高低主次之分。用得恰当，适应思想内容的表达，就是好的、美的；用得不恰当，就是不好的、不美的。陈望道论述“美辞堆砌病”时谈到“有些人不注意语言文字和题旨情境的关系，错觉以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备着做文的时候用。殊不知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旨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恰当不恰当，用得恰当便是美，用得不恰当便是丑。”^②这个恰当不切

①倪宝元《修辞》第3—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1页。

当，首先要看是否适应思想内容的表达，也就是说能否准确、鲜明或生动地反映思想内容的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思想内容决定了修辞形式。陈望道说：“一切健全的写说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①张弓也说到：“美的辞式是健康、充实、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表现。‘内容决定形式’，这话是我们研究修辞者应该注意体会的。我们说话写文章都应该按主题、中心思想和目的决定词句的取舍和用法。内容是先决条件。”^②

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不象古希腊那样脱离内容，专讲形式，而是比较科学地论及了修辞要适应思想内容这一条原则的。《周易·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中所说的“情欲信，辞欲巧”，一直被引申为作文、修辞的一个准则。所谓“诚”，指说写内容的信实，作者感情的诚实而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涉及有关修辞理论的著作。他在该书中认为，修辞并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它与内容主旨分不开，应该“文质两备”，要是两者不能兼顾，就“宁有质而无文”^③。王充在《论衡·超奇》中提出写说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和谐统一，既要有真诚的内容，又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完美的表达形式。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中，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这里所说的胸臆中的“实诚”“意”，就是指思想内容，著之于竹帛的“文墨”“笔”就是语言表达形式，内容和形式要求“自相副称”，和谐统一。王充十分强调

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1页。

②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第12页。

③《春秋繁露·玉杯》。

内容的主导作用，他把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根株”和“荣叶”，“实核”和“皮壳”，“体”和“毛”的关系。他认为，只有思想内容在胸臆中酝酿成熟了，“文墨”才能形之于“竹帛”，有了“意奋”才能“笔纵”。如果胸中无“实诚”，“意”不“奋”，“笔”就不能“纵”起来，文章也就不能写好。刘勰《文心雕龙·征圣》中把这一原则视为作文的金科玉律：“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再如，此后的“炼字先炼意”，“诗以意义为主，文以用意为上”等等，都是符合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原则的。

有人认为，修辞只是外加的、装饰性的东西，这未免失之偏颇。王安石说：“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①他以为文辞应以实用为主，华巧不过是奢侈的装饰而已。这一看法有正确的一面，但把修辞看成是外加的，那又是片面的。近人讲修辞，有人把修辞格比作衣服上的装饰性的东西，这是失当的。

内容决定形式，修辞形式要适应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但并不是说要修辞讲内容——主题、中心思想、题材等，而是要我们弄清修辞的根据和原理，懂得“内容又常为生活所决定”^②；要懂得“修辞技巧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目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③要我们充实生活，注意观察，不仅着眼于修辞的“流”，还要着眼于修辞的“源”。

我们在强调内容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形式，首先，说写的内容不能离开形式而单独存在，“情见于辞，意验于

①王安石《上人书》。

②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1页。

③同上第14页。

言^①”，无论是“说”或“写”，都要着眼于它们的语言因素、语言特点。其次，形式也反作用于内容，运用恰当的修辞形式又可以深化思想内容的表达，或者说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所以，修辞现象的表达形式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自成为独立的科学。为了说明这种修辞形式的表达作用，我想不妨先比较下面两首歌词：

- | | |
|-----------|-----------|
| ①妹妹找哥泪花流， | ②妹妹找哥流眼泪， |
| 不见哥哥心忧愁， | 不见哥哥心忧愁， |
| 望穿双眼盼亲人， | 望穿双眼盼亲人， |
| 花开花落几春秋。 | 花开花落好几年。 |

这两首歌词，虽然内容相同，但读了第二首却感到如同嚼蜡，索然无味。这是什么道理呢？例①押韵，例②不押韵；例①用了比喻（“泪花”）、借代（“几春秋”），而例②只是直言其事；例①适应诗歌语言的修辞要求，例②违背了诗歌语言的修辞要求。所以修辞要系统研究修辞形式的规律。我们首先讲究“修辞要适切题旨”的原则，就是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修辞形式的统一，千万不能脱离内容为修辞而修辞，忘记修辞的根本目的所在。

其次，修辞要适应语体。目前使用“语体”这个术语是存在分歧的。语体，也叫文体，或语体风格。它是适应不同交际目的、任务、内容、范围等需要运用全民语言所形成的语言功能变体，是以语言交际功能为依据而建立的风格类型。语体通常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大类，口头语体又再分为生活语体、工作语体等，书面语体又可分为文艺语体、政论语体、科技语体、公文语体。语体是历史上长期来形成的。

语境决定语体的选择。为什么语体也要作为一条修辞的原

①王充《论衡·超奇》。

则，而且列在第二位呢？

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承担着各种功能作用，分别与人们各个不同交际领域相联系。体裁表现原则是语体理论的基础，因此，语体和文章体裁有相对对应性。语体的出现尽管有非语言的原因，但语体之间确有语言运用的不同要求和内部的特征的区别。因此，一定的语体和风格，要求一定的语词、句式、辞格、语音手段等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一定的语词、句式、辞格、语音手段等往往只适应于一定的语体和风格。这是一条普遍的原理。以书面语体来说，文艺语体是通过描述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来表达主题思想的。它不是记述的，而是描绘的。语言的鲜明性、生动性、形象性是它的基本要求，语言的艺术化是它的追求目标。在语言运用上，用词极为广泛，各类词语都用得上，常使用词的转义，特别是临时转义。句式复杂多变，但以短句为主，比较接近口语。它要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几乎所有的辞格都用得上，而且比其他语体用得更多、用得集中。科技语体就不同于文艺语体，它是记述的，而不是描绘的。它要求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准确、简洁、系统地叙述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现象，论证它们的规律性。因此，科技语体以概念的准确、判断的严密、推理的确当为主要特点。在选用词语上，严格要求使用单义词语（术语），反对随便使用多义词语，防止概念混乱。另一方面，抽象词语，外来词语也比较多，句式严整而又少变化；允许大量运用符号、公式、图表等形成一套特殊的表达方式。辞格的运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夸张、比拟、借代、双关、婉曲等修辞方式，就几乎不用。科技语体的风格，要求平实、明快、严谨。政论语体大都是针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种语体要求立场

鲜明，感情强烈，具有战斗性。因此，政论语体要把严密的论证和形象的描绘交织在一起，把宣传的鼓动性、严密的逻辑性和鲜明的形象性结合在一起。在选用词语上要求使用一定的政治术语，句式严整而多长句，除夸张、比拟、借代、双关、婉曲等很少使用外，其他修辞方式的运用，则和文艺语体相近似。为了增强表达的气势和力量，反问、排比、对比等修辞方式则是常用的。公文语体，它以记述为特征，实用为目的。它不追求语言的形象性和艺术性，而以准确、简要、程式化作为基本特征。公文语体有上行下行的区别，以表明公文的性质和责任关系。它有专用的一些术语，如“决议、核准、复审、依法惩办、参照执行”等专用语。在公文语体中，一般不允许使用夸张、比喻、双关等修辞方式。公文语体风格总的要求是平实、简要、明快、讲究效率。

因此，讲修辞，在要求适应思想内容的同时，还要求适应语体；要有修辞的整体观念，避免支离破碎地考虑修辞。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原则，抓住语体的特点来讲修辞，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这一条修辞的原则往往不被人重视。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应该说对它有一定的研究。如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的不同体裁和文章的不同风格的关系问题，他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成为我国文体和风格研究的先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比较全面地论及了“文体（即语体）”和“风格”。它虽然跟我们今天修辞学讲的语体、风格不完全相同，但也有一致的方面。他在《体性》篇中把文章的风格（即“体性”）分成八类：（1）典雅（把经典的词句熔化在文章里）；（2）远奥（话语说得曲折玄妙）；（3）精约（用很精炼的字句表达复杂深刻的道理）；（4）显附（明白通

畅地说，不拐弯抹角）；（5）繁缛（旁征博引，运用种种比喻和修饰）；（6）壮丽（气势磅礴，文采风奋）；（7）新奇（不依傍古人，不摹仿当代名家，有所创造）；（8）轻靡（内容单薄，只知堆砌词藻）。这些指的是言语的个人风格。《时序》《通变》等篇还谈到了不同时代文章的语言风格。从《辨骚》到《书记》的二十一篇中，他把当时所有文体归为五大类三种性质，论及了语体。总之，刘勰论文体和风格，突出了语言特征，指出不同“体”的语言特点有不同的表现，并且作了比较的研究。他还提出要“得百氏之华采”，教人学习各种风格。《体性》篇指出：“故宜摹体之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但是曹丕、刘勰在论述文体、风格同修辞的关系，还是不够自觉的。以后陈骥的《文则》，王构的《修辞鉴衡》虽然也都谈到语言风格，但也未能与修辞联系起来。陈望道注意到了“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①谈到在对修辞方式要注意个性观察时，指出“体式、风格不同，也颇会形成大同中的小异。例如把诗歌和歌谣相比，大抵是歌谣质朴得多，每用一个方式往往从头直用到底。这也要分别留神才是。”^②陈望道在这里就语体、风格和修辞方式的关系观察得很细，但未能把修辞要适应语体、风格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提出来。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吸取了苏联功能修辞学派的观点，着重谈到了修辞和语体的关系，指出“各类语体根据各自的特点，对汉语各因素、汉语修辞手法有不同的要求需要，各因素各手法在各类语体中有不同的适应性（发挥一定作用）和局限性（不能运用、不能发挥作用）”^③，但也是没有把修辞必须适应

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0页。

②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15页。

③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第27页。

语体作为一个原则而提出来。近年来，修辞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已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已把它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可是也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与当前我国对语体和风格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也有关系。

今天，我们讲修辞，应该要加强探讨修辞与语体的关系，使修辞学更富有科学性。

语体是历史形成的，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是变化发展的；语体类型之间互相排斥，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又是互相渗透的，即有交叉性。文艺语体也可以吸收政论语体的风格，政论语体也可以吸收文艺语体的风格，等等。因此，选择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不能僵化、绝对化。既要注意规定性，又要注意交叉性，甚至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也可以利用语体色彩不调和，来作为修辞手段，有意造成风趣和幽默感。有时一个词语的选用都可以产生这种效果。

再次，修辞必须适应语境。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即言语环境。狭义的语境，包括交际双方说、听、写、读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以及说话的前言后语或上下文等因素。广义的语境，还包括时代、社会的性质、特点、风习、文化传统等，交际双方的个人情况，身分职业、思想性格、处境心情、文化教养、生活经验、语言习惯、语言风格等因素。因为语言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所以语音、语义、语法、修辞与语境都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修辞是讲综合运用语言的，修辞与语境的关系更为复杂多端，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重要。语境广狭义的诸要素，制约着语气、语调、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制约着词句的选择、配合、组织、语义确切或模糊的表达，制约着修辞方式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处理等等。这些都助于表达一定的修辞色彩，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所以，讲修辞，在适应题目、